

中國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

启功题

2010—2011年集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中國李白研究

中國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

吾北是

2010—2011年集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李白研究. 2010~2011 / 中国李白研究会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1

ISBN 978-7-5461-2592-3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李白(701~762)—人物研究 ②李白(701~762)—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K825.6-53②I207.227.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7797 号

中国李白研究(2010~2011 年集)

出版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石松

责任印刷:李磊

装帧设计:陈强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销: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制:合肥市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4235059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5.875 字数:500千字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薛天纬

副主编:陶新民 曹 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友胜 朱玉麒 朱易安 张瑞君 余恕诚

陶新民 曹 明 阎 琦 葛景春 詹福瑞

蓝 旭 薛天纬

编 校:韦 兰 胡 俊

目 录

20世纪以来李杜比较研究述评·····	胡永杰(1)
《李白与巴蜀资料汇编》序·····	丁稚鸿(18)
巴蜀文化与李白·····	蒋志(39)
李白在故里的遗迹风物考·····	刘木云(58)
象耳山读书台是附会之说·····	敬永谅 郭兴隆(72)
李白与成都·····	刘友竹(76)
唐人之李白序志碑传辨读·····	杨栩生 沈曙东(85)
关于李白与安徽的五个问题考论·····	汤华泉(99)
李白“古乐府之学”臆解 ——围绕李白传授韦渠牟“古乐府之学”的断想···	李芳氏(108)
关于游侠诗的界定问题 ——从李白《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说起···	刘飞滨(125)
李白书写女性诗歌之价值判断·····	刘朝谦 曾娅先(135)
李白首开“金陵怀古”咏叹的特殊意义·····	王志清(143)
李白日常行为与思维的“神话性”·····	罗鸣放(157)
李白《静夜思》研究热点述略及再解读·····	朱秋德(168)
寓愤于戏，何有悲哀 ——试谈李白《将进酒》创作视角·····	张家琪(176)
李白《明堂赋》系年新考·····	程安庸 刘勇(184)
论李白的诗序·····	吴振华(194)
李白和独孤及比较研究三题·····	郭树伟(207)

法的破立

- 张旭与李白书法之比较 沙 鸥(219)
- 简论李白诗歌对卢仝创作的影响 郑慧霞(236)
- 李颀诗风质变原因探析 隋秀玲(249)
- 李白宋代接受史概述 张瑞君(256)
- 论吴澄对李白杜甫的接受 潘殊闲(277)
- 试论王世贞对李白的接受和评价 王红霞 任龙(290)
- 论洪繻《李白春宴桃园赋》对李白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之复与变 [台湾]黄舜彬(312)
- 谈李白送赠孟浩然二诗中的“故人”和“夫子”两词
..... [香港]邝健行(347)

莲花中的李白

- 从词汇角度对诗歌表现的分析 [日本]市川桃子(357)
- 李白“仙风道骨”臆释 康怀远(370)
- 李白形象的另一种解读
——谈《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李白形象 朱全福(381)
- 读李札记 阮堂明(390)
- 李太白诗话十则 罗 宁(404)
- 略论李白人格精神的现代启示意义 崔际银(415)
- 2009~2010年中国李白研究综述 孟祥光(425)
-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李白国际
学术研讨会综述 胡 俊(443)
- 2009年李白研究论著目录 韦 兰(458)
- 2010年李白研究论著目录 韦 兰(479)

附 录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李白国际

- 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薛天纬(492)
-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李白国际
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葛景春(495)
- 江油学术考察招待会致辞 薛天纬(499)
- 中国李白研究会选举公报 (501)
- 深切悼念朱金城先生 (502)

20 世纪以来李杜比较研究评述

胡永杰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两人同一时代，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他们的思想个性和诗歌风貌却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自中唐开始，一千多年来人们一直乐于将两人进行比较研究。20 世纪初中国学术研究发生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一百年来学界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热情也一直不减，并取得了丰硕的新的成果。20 世纪以来的李杜比较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初至 1949 年，二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6 年“文革”结束，三是 1977 年至今。下面就中国大陆范围内这三个阶段的情况分别略作评述，台湾等地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为资料所限，暂付之阙如。

—

1924 年发表的胡小石先生的演讲稿《李杜诗之比较》^[1]一文，是所知 20 世纪最早的李杜比较文章。此文侧重从诗歌艺术上的表现去比较李杜诗歌的不同，他认为两人之诗在用字、内容、声调上都明显不同。李诗重意，无奇字新句，杜诗则出语惊人。杜甫之

前人们作诗的内容不外叙情、描写山水、玄谈等几种，而以诗描写时事的则不多，诗中加入议论尤为少见，“以诗描写时事的受历史化，以诗输入议论的受散文化，善于描写时事而融化散文的风格，不能不推子美为第一人”。李白虽兼用复笔，但好处则在单笔；杜的好处，全在排偶。李白的诗体有选择，故古多律少；杜诗无选择，只讲变化，故律体与排偶都多。李诗声调很谐美，杜则多用拗体。因此，文中认为，李白守着诗的范围，杜甫则抉破藩篱。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做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命的先锋。胡小石先生此文，虽非对李、杜两者的不同作全面的比较，但在诗歌艺术方面，他的比较涉及各个方面，已经粗具体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李白是诗歌史上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命的先锋；李白诗是从《古诗十九首》至盛唐诗歌艺术的总结和结束，杜甫的诗“真是无所不学，但同时又能无所不弃，也不愧为元和以后诗风之开山师祖。”^[2]把李杜诗歌的差异上升到中国诗歌前后期的转变的高度去审视，眼光极为宏阔而深刻。这个问题，后来胡适先生出版的《白话文学史》^[3]中又有所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 20 世纪很受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白话文学史》中指出，8 世纪下半叶的唐代文学与 8 世纪上半叶截然不同了，“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盛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8 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4]李白属于盛唐的盛世浪漫文学，杜甫则是安史之乱后新的时代文学的开派者和最杰出的代表。胡适先生的这一观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了很多治唐代文学的学者的响应，当时学者撰写的重要文学史或唐代文学论文、论著，如陆侃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诗史》^[5]、苏雪林先生的《唐诗概论》^[6]、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7]、黄泽浦先生的《七五五年在唐诗上之意义》^[8]、李嘉言先生

的《唐诗分期问题》^[9]等,虽然关于唐代文学的分期见解不一,但大多数都把李白和杜甫划归于安史之乱之前和之后两个不同的文学发展时期。这些著作和论文虽没有专门比较李杜的异同,但却从唐代文学以至中国文学整体发展历史的高度去审视李杜,发现了两者差异中所代表的唐代文学的根本性转变,拓展了李杜比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学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出现了傅东华先生的《李白与杜甫》^[10](1927 年)和汪静之先生的《李杜研究》^[11](1928 年)两部专著,使李杜的比较研究走上深入。傅著共分十章,“来自批评家的李杜比较论”一章对前人关于李杜比较的观点进行了回顾,批评了抑李扬杜和抑杜扬李两派的观点,对于李杜并重,不加轩轻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值得尊重,但“可惜他既知其异而又必指出‘忠爱之志’‘笃于君上’一点,认为‘同归’之处,那就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了,而且他两人的异点虽亦未尝不有些道着,却仍旧只是一方面的观察而又没有说出所以然来”。所以主张:“我们若要精密比较李杜的异同就须从各方面——例如他们的气质、境遇、遭际等等——加以观察。”可见他是力求用新的批评标准,从各个方面全面比较两人的异同,并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出两人差异的“所以然”来。全书十章,他用了“遗传的影响和少年的时代”、“‘归来桃花岩’和‘快意八九年’”、“居长安的经验不同”、“晚年的不幸相仿佛”、“两诗人的共同命运——客死”六章的篇幅探究李杜家庭身世的遗传因素、青少年、中晚年的经历遭际的异同,足见他确实极为注重李杜差异的原因的探究。“人生观的根本差异”一章,认为李白的人生观非儒非老非杨非墨,大致可称为一个超世主义者;而杜甫则是一个真正的儒教信徒。“同时代的不同反映”一章认为对于玄宗后半期的荒怠侈放和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反映于杜甫诗中比反映于李白诗中较为真切。“从纯艺术的观点一瞥”一章则认为李杜在大的方面可区分为“主观的诗人”和“客观的诗人”;李白诗主要用主观描写法,杜诗则主要用客观描写法;修辞上杜甫力求近于自然、李诗力求超脱

自然；李白是复古的、模拟的，所以多袭用古乐府的题目，律诗较少，杜甫是创新的、从今的，集中绝少拟古之作，其律诗为千古绝唱。总体而言，本书较为全面地涉及了李杜异同的主要方面，确实初步做到了“从各方面观察”李杜的异同。

汪静之先生的《李杜研究》共分七章，第一章“李杜比较论”专门就李杜的异同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文中首先回顾了李杜的友谊，对历史上崇李崇杜两派的偏颇观点表示了批评。对尊杜派对杜诗的评论，和傅东华一样汪氏也表示了不满，认为“他们爱用治国平天下的眼光去批评诗人，把诗与忠孝节义并为一谈”，把杜诗称为“周公制作”“孔子大成”，“简直不把子美当作诗人，真是唐突子美”。因此作者主张从两人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为、嗜好、身体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汪著从境遇、行为、嗜好、身体诸方面考察李杜的差异，和傅东华先生相似，都是从外部研究的角度进行比较，但汪先生的视野更广泛细致。在思想与性格方面，汪著认为李白悲观、个人主义，为肉所占但未到极端，杜甫乐观、利他主义，为灵所统治，但亦未至极端；李白离经叛道，杜甫拘守礼教；李白社稷苍生从未系其心，杜甫以民生疾苦为念；李白对战事不闻不问，杜甫非战，忧世忧时；李白不反对贵族，杜甫憎恶贵族；李白是出世的，杜甫是入世的；李白性格浪漫，杜甫性格敦厚。虽然这些看法有些不够准确，但笔触的全面深细确实非常精彩。汪著中最为着力的则是在作品方面对李杜不同的分析。他认为总体上李白是贵族的文学，是浪漫派、唯美派，杜甫是平民的文学，是人生派、写实派。并引用周作人《贵族的平民的》一文中的说法对两者作了界定：“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华所说的求生的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的意志。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汪氏并表明平民的、贵族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两者是一物的两面，并无高下之分。文中认为，李白多抒情诗，杜甫多叙描诗；李诗中无事物可寻，全是情感，杜诗中处处有事物，全是经历。李多抒发个人颓废的心情，杜常描写社会实际状

况；李诗中多女、酒二字，杜诗中多饥、饿、肉、饭、饱五字。这些主要是对李杜诗歌内容特点的比较。李白诗纵横驰骋、如瀑布之奔泻，杜甫诗苦意安排，如大江之缓流；李写诗时信笔直书，一气呵成，杜写诗时惨淡经营、一丝不苟。这些是对两者构思、创作时才思特点的比较。李白诗偏于南方文学的缠绵委婉，杜甫诗偏于北方文学的慷慨悲壮；李诗极豪爽轻快、悲哀颓丧、自然缥缈，杜诗极工整劲健、沉郁严肃，慷慨激烈。这是对两人诗歌风格的比较。李诗七言律诗一共八首，杜绝句亦有对偶，李以文言为诗，用方言极少，杜以方言俗语入诗处甚多，这是对二人诗体、语言的偏向的比较。可见汪著对李杜诗歌的比较比傅东华之作更为全面，更具体系。

可以看出，傅东华、汪静之先生的两部著作全面吸收了新时代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以之去审视李杜的差异，代表着 20 世纪前期李杜比较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一方面吸收新的文学观念，摆脱了封建时代文学为经学、政治附庸的旧观念，不再以忠君爱国、有益风教为评价文学价值的唯一和最高标准，因此能够比较正确客观地评价李杜的不同，既对李白诗歌价值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也把杜甫从“诗圣”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发现其诗歌多方面的价值，因此他们都持有了李杜并重，不必强加轩轻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吸收西方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阔了研究视野，对影响李杜诗歌风貌的外部原因，即家庭、时代、经历、境遇、性格等的不同给予了重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同时对于李杜诗歌自身的比较，也更加深入、翔实、全面和系统。

三四十年代也出现了几篇专门比较李杜异同的文章，如王兆元的《李白与杜甫》^[12]、黄眉玉的《李白与杜甫》^[13]、履泽的《略谈李杜的比较》^[14]、王亚平的《杜甫与李白》^[15]。这些文章对李杜的比较大致借鉴汪静之《李杜研究》的观点，发明之处不多，但可以看出这时期李杜比较研究热情不减的情况。其中王亚平先生之文对一些论者认为“杜甫是启后的，李白是承先的”，“把李白描写成一个颓废浪漫，不管天地的狂放诗人，把杜甫画成一位忠厚的儒道君

子”的观点表示不能苟同。他主要从李杜的生活、思想、友谊、作品的主要倾向、风格、创作思想、创作手法、表现技巧等方面进行比较。而在这些比较之前,作者对产生两位大诗人的时代政治、文化环境作了论述,这方面的论述是之前李杜比较研究者较少涉及的。

重杜轻李的声音的重新抬头是三四十年代李杜比较研究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现象。早在20年代,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中就表现出在李杜之间偏好于杜甫的倾向,他在“第二编第十二章”中说,李白的态度“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所以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中遨游自得,与我们不发生交涉”,“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16]。三四十年代的研究者心态受内忧外患交织的时代环境的影响,普遍和杜甫有着相通和共鸣,因而更多地表现出重杜轻李的倾向。僧墨《杜工部的社会思想》^[17]一文中认为:“李是庄周、屈原一流人,杜是孔丘、墨翟一流人;庄屈在文艺上固有其极高的价值,然不若孔墨的切合实际生活,从现实主义的立场说实有取于杜甫。”李广田先生的《杜甫的创作态度》^[18]认为,人们关于李杜之间无所轩轻的观点,“大都只就风格立论,若以思想内容而论,则高下自可以判然”,“以诗的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为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劣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傅庚生先生的《评李杜诗》^[19]一文,更是有意“把李杜二人的诗,选择它方面相近而方向殊殊的,比较着探讨一翻,然后衡定一个甲乙”。他认为,李白的天才自放,任谁都要退避三舍,但杜甫在文学情思上的成就,却是“非白可到也”。并说,文章创作以感情为君,思想为臣,想象为佐,形式为使;君臣佐使各如其分,真善美浑同如一,算是创作的极诣。若以此一种客观的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文中傅先生对李杜诗情感的各个方面,作了细致地比较分析,并处处表现出抑李扬杜的态度。

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6 年“文革”结束是李杜比较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苏仲翔先生的《李杜诗选》“导言”^[20]中对李杜的异同作了分析；郭沫若先生在杜甫诞生 12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21]把李杜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其他，中国大陆范围内，对李、杜进行具体比较的文章和著作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先后出现了重杜轻李和扬李抑杜两种或隐或显的倾向。

1949 年至“文革”前，虽然并没有出现明确的扬此抑彼的声音，但学界对杜甫的重视却是大于对李白的重视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时思想性、人民性、爱国主义等是评价文学的主要标准，杜甫比李白更符合这些标准。就如燕白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解放后，硬性把李白和杜甫作对比的‘优劣论’是少见了，但诗坛上推崇杜甫的究竟还是大多数。主要是从杜甫的人民性、爱国主义和反对侵略战争、要求和平这三方面着眼的。”^[22]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学者们的思想情趣更易于接近杜甫的缘故。例如萧涤非先生就曾坦诚地指出：“过去，我自己也未能摒除这一积习，存在着抑李扬杜的倾向。”^[23]“文革”期间，则又出现了非正常的扬李抑杜倾向。先是 1972 年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表现出极力扬李抑杜的态度。郭老扬李抑杜有其审美偏好的原因，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说过：“至于唐代的几个诗人，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不能拿别人的嘴巴来代替我的嘴巴……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柳宗元也胜于韩愈，他们更接近于诗的本质。”^[24]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郭老更喜欢李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背离文学的实际扬李抑杜，甚至用曲解李、杜诗歌的方式去拔高李白、贬低杜甫，这种做法显然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正如萧涤非先生所指出：“像郭老这样‘爱之

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绝对化的抑扬法，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有害的。”^[25]后来又出现了梁效的《杜甫的再评论——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26]和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76年版），它们完全是当时反儒尊法政治运动的产物，把李白看法家诗人、把杜甫主要划归儒家诗人。这种做法已经不是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扬李抑杜了。

1977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内地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新时期，李杜的比较研究也快速发展，取得了新的、更为丰富的成果。“文革”结束以来的李杜比较研究的成果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批判了“文革”时期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及儒法斗争路线下通过诋毁、曲解杜甫以扬李抑杜的错误观点，统一了李杜并重，各有特色，不必区分高下的认识。二是对李杜各方面的差异作了更加深细的挖掘。三是出现了几部更加深入全面探讨李杜异同和李杜之变的专著。四是对李杜优劣、李杜并重等问题的历史作了一定的梳理和总结。

“文革”结束不久，学界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扬李抑杜的论点进行了批评和反思，各类对《李白与杜甫》中贬低、曲解、误解杜甫的观点进行批评或商榷的文章达二三十篇之多。这方面萧涤非先生的意见较有代表性。他的《关于〈李白与杜甫〉》^[27]一文对《李白与杜甫》中存在的“扬李抑杜”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商榷，并对如何对待李杜两位大诗人的问题（即李杜优劣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在如何对待李杜二人的问题上，韩愈、苏轼的二者并重的观点是可取的。李杜二人“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他们是分道扬镳，而又各有千秋。李白不能包括杜甫，杜甫也不能包括李白。我们既需要杜甫，也需要李白”。他还指出：“尽管‘比较’原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但我以为在评论李杜二人时，最好是各评各的，不要把他们拉在一起，扭作一团，非比个你好我歹不可，让他们对立起来。”萧先生的意见基本上可以代表新时期李杜比较研究者的共同观点，这时期的李杜比较论著绝大

多数都以比较二者的异同为主,而不再去分别他们的高下优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区别李杜优劣的声音这时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裴斐先生在《历代李白评价述评》^[28]一文中表达自己对历史上李杜优劣争论的看法时就说:“在总体评价上,我同意韩愈,即认为李杜都是光焰千古的伟大诗人;在艺术评价方面我同意严羽、王世贞、胡应麟等人关于李杜各有特色、各有所长的观点,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把问题讲透;在思想评价方面我和宋代诋李者相反,认为不是杜优李劣,而是李优杜劣。”至于认为思想方面李优杜劣的原因,则是在他看来杜甫既是一个杰出的、写出过“一代国史”的大诗人,又是个最平凡不过的、“奉儒守职”的小官吏。他那些伤心忧时和鞭挞弊政的诗篇对统治阶级每有“美刺”和“讽谏”,但一般并不超出封建地主阶级“温柔敦厚”和“干预教化”的诗教,至于他为历代人最称道的“忠君忧国”、“忠义气节”、“孤忠”和名句“每饭不忘君”等,则更与封建伦理相符。而李白的思想则超出了以儒为宗的封建士大夫所能接受的范围。裴斐先生的观点可能源自他思想性情和李白更加相通之故,是正常范围内的个人偏好,无可厚非。

新时期李杜比较研究第二方面的成果是,不少文章专就李杜诗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向深处细处挖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袁行霁先生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29]一文,是从意象的构成、组合、表现等方面对李杜飘逸、沉郁的不同风格进行探讨,以期对李杜诗歌艺术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他认为李白和杜甫诗中的意象各具鲜明的个性特点。在意象的表现上,李白多虚处用力,虚中见实;杜甫则实处用力,实中有虚。在意象的组合方式上,李白诗中的意象组合比较疏朗,很好地体现了他的飘逸之风,杜诗的意象组合则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苏为群先生《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30]一文则对李杜山水诗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比较。他认为,从六朝至唐,山水诗发展从繁细的景物刻画到简约的大笔勾勒,从客观的描述到融情于景的印象山水,是一条可见的发展线索;同

时,从谢灵运以来的在叙述过程中精细地描摹景物的传统也并未中断。李白的著名山水诗篇沿前一条线索发展而来,涵括了王维山水诗的特色和成就,注重神韵和理想美;杜甫的纪行诗中对山水的描绘继承并发展了谢灵运等人在游历行程中对景致的细致具体的描摹,注重写实和现实美,这是两位诗人最本质的区别。薛天纬先生《李杜歌行论》^[31]一文对李、杜歌行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论说,认为两人是盛唐时代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歌行作家,李白古题乐府与杜甫新题乐府共同具有的歌行化倾向,代表了中国古代抒情诗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与实际走势。两人站在各自的立足点上,从不同方向强化着古题与新题乐府的抒情功能,推动着它们向抒情自由度最大的歌行靠拢、演进。两位伟大诗人殊途而同归,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他们联手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另外,刘明华、杨理论先生《李杜诗歌中的女性题材及抒情特征三论——李杜诗歌女性观念的比较》^[32]、杨理论《论李杜的贵妇和妓女题材诗歌——李杜诗歌女性观念的再比较》^[33]两文专就李杜的女性观进行比较;沈志权先生的《李杜咏月诗论略》^[34]专就李杜咏月诗的异同作了分析;康怀远先生的《李杜〈忆旧书怀〉〈北征〉二诗的比较研究》^[35]一文则对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和杜甫的《北征》两诗作了比较分析,从中透视两位风格迥异的天才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相通之处,即“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像是结合在一起的”;王辉斌先生的《李杜关系新探》^[36]、冯小禄先生的《李杜友情新析》^[37]对李杜的交往与友谊作了新的探究;王定璋先生的《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杜青年时代的诗歌》^[38]中指出了李、杜前期诗歌在盛唐气象的熏染下都呈现出欢乐浪漫、雄伟豪放、富于理想和追求的面貌的共通之处;徐希平先生的《李杜思想与创作受道教文化影响之表现及其意义》^[39]中对李杜思想创作中所受道教的积极影响之处作了分析;于南湖博士的《杜诗语言艺术研究》^[40]一书中《李杜诗歌语言风格及其形成因素之比较》一节则专对李杜诗歌的语言风

格进行了比较,并对形成原因作了探索。

这时期关于李杜的诗学、美学观念异同的比较,也出现了多篇文章。金启华先生的《李杜诗论的比较》^[41]一文认为,李杜诗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其共同之处,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对建安以前各家之作,都取精用宏,对唐代当时诗人都不是轻视的。两人的不同之点,主要表现在对声律的看法上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高起学先生的《李杜诗歌主张异同漫议》^[42]是从李杜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态度、对待齐梁文风的态度、学习古代和如何学习古代的看法、两人所继承的艺术传统和采取的艺术创作方法四个方面翔实而深入地比较了两人诗歌主张的异同。萧瑞锋先生的《李杜诗论异同辨》^[43]中则指出,李杜诗论的差异之处主要是:其一,李白更多地注重“逸兴”,杜甫则更多地强调“诗律”;其二,李白更多地注重“批判”,杜甫则更多地强调“继承”;其三,李白更多地注重“创造”,杜甫则更多地强调“学习”。其相同之处则是:其一,李白和杜甫都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继承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其次,李白和杜甫都主情辞相副、文质兼胜,即诗歌的内容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其三,李白和杜甫都倡导清新、质朴的诗风,反对镂玉雕琼,属辞绮丽。并对李杜诗论异同的原因作了分析。陈应鸾先生的《论李杜的清丽观》^[44]一文则专就李杜的清丽观进行比较,认为李、杜二人对清、丽的态度有同有异。其相同处在于,二人都重清,并不同程度地主张清、丽结合。其相异处在于,对六朝(尤其是齐、梁、陈)文学的绮丽,李持否定的态度,杜持高度肯定的态度。并就两人对“丽”的态度所以有异的原因作了探讨。

新时期李杜比较研究第三方面的重要收获是,出现了罗宗强先生《李杜论略》^[45]、燕白先生《简论李白与杜甫》^[46]、葛景春先生《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47]等几部重要的专著,对李杜的异同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新的开拓。

罗宗强先生的《李杜论略》共分七章:李杜优劣论之历史回顾、